

从马克思“机器论片段”看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生产危机

李沐春

【摘要】当前，人工智能成为大机器体系最新的技术形态并得到广泛应用，对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被应用于精神生产领域之后，其对作家的主体性和作品的审美性提出了挑战。根据马克思“机器论片段”揭示的生产模式，人工智能在精神生产领域的应用可能引发文学生产的异化劳动，进而导致文学生产丧失创造力和审美性。在人工智能时代，只有持续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理念更新，才能克服劳动和审美之间的对立，在精神生产过程中实现劳动性和审美性的统一，让文学生产成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实现。

【关键词】“机器论片段” 人工智能 文学生产

【作者简介】李沐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4)11-0145-14

一、引言

马克思在一部被后世学者命名为“机器论片段”的手稿中明确指出：“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占有，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揭示了后工业时代的人在以机器体系为劳动资料的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产过程中被逐步异化的机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判断。2017年5月,微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微软小冰”出版了其自主创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①这一事件在人工智能进入文学生产领域的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它表明,作为“自动的机器体系”这一劳动资料的最新形态,人工智能选择以文学生产的方式承担“诗人”这一社会化角色,这也显示了马克思“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论断在文学领域的重要价值。“微软小冰”是人类研发出的以情感计算为核心的一套完整人工智能框架,它无疑属于“物化劳动”范畴。“微软小冰”“生产”诗歌作品这一行为表明,物化劳动在形式上已经可以取代人类作为活劳动的作用,甚至具备了挑战人类作为精神生产“主体”地位的能力。

事实上,除了文学领域,人工智能还进入了绘画、作曲等多个文化艺术领域,进行具有“原创”性质的艺术生产,如2018年由佳士得拍卖行售出的画作《埃德蒙·贝拉米肖像》,就是由法国创作团队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创作完成的。2022年末,由美国OpenAI公司推出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再度引爆了相关话题,虽然开发者号称这是一款对话式自然语言处理工具,但它在翻译、编写文案甚至创作诗歌等方面的表现令人们再次意识到人工智能“生产”文学的可能性。本文试图以马克思“机器论片段”的分析框架为指导,对人工智能时代可能发生的文学生产危机加以讨论。

二、马克思“机器论片段”的理论意义

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很早就有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计划。遗憾的是,1848—1849年的革命运动使他不得不暂时搁置这一计划。1849年,马克思在侨居伦敦之后重启这一工作。他利用一切条件,广泛搜集和仔细阅读大量文献资料,既批判地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理论成果,又详细地考察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完成艰苦的准备工作后,马克思着手对其已掌握的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精心提炼,全面而深刻地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

1857—1858年,马克思完成了他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之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以下简称《大纲》)。这部著作被

^① 小冰:《阳光失了玻璃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编者以上下两册的形式分别于1939年和1941年在莫斯科出版。这部著作共包含7个部分，分别为《巴师夏和凯里》《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段和第三章开头部分》《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纲草稿》。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第一次明确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本架构和部分具体要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不仅奠定了马克思整体经济理论的基础，而且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对抗性矛盾以及发展趋向。

被西方学者称为“机器论片段”的部分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资本章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马克思在该部分强调，机器体系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他认为，作为固定资本的劳动资料取得机器体系的形式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说到底，资本的逐利本性驱使它不断地发展生产，导致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并在逐利过程中大量利用科学研究成果。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机器体系是劳动的产物，拥有极高的生产效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始终从属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机器体系原本是减轻劳动的手段，资本主义制度却将它变成强化劳动的工具，工人也就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后的更高级的未来社会中，机器体系和科学技术将不再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而是被用于造福全社会。需要强调的是，“机器论片段”这一提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未曾出现过，只是被学界约定俗成地用以特指“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

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翻译家雷纳托·索尔米（Renato Solmi）翻译了马克思《大纲》的部分内容，并以《机器论片段》为题，发表在《红色笔记》杂志1964年第4期。^①随着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Antonio Negri）、维尔诺（Paolo Virno）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推进（尤其是奈格里对《大纲》的创造性解读），“机器论片段”被赋予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随着意大利自治主义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机器论片段”这一具有明显理论偏向的概括性指称被学术界普遍接受。^②

^① 参见鲁克俭：《意大利的马克思研究：一个思想史的考察》，《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论丛》2019年第1期，第166页。

^② 参见孙乐强：《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命名由来、历史定位及其理论评析》，《江海学刊》2024年第2期，第49页。

马克思在《大纲》第六部分《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对笔记本中每一页的内容都写了提示性质的“提要”，其中与“机器论片段”相对应的部分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价值尺度）和它的发展本身之间的矛盾。机器等（3）”。^①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只是出于自身理论建构的需要，以最后一个关键词“机器”为核心切入点来完成对马克思经典论述的重构。他们认为，重新阐释马克思《大纲》的关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重新构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以及如何重新分辨阶级矛盾的表现形式。对今天的文学生产来说，这一理路依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将文学生产置于“机器论片段”的理论视域下进行反思，本质是将反思的要点从单纯的技术领域或者文化领域转至政治经济学领域，在“物质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框架下对当下文学生产的本质和意义进行系统把握和批判性反思。

马克思认为，作为一种劳动资料，固定资本在纳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之后，其形态发生了变化，并最终表现为机器体系。此时，工人与机器体系，也即活劳动与劳动资料之间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独立要素的关系，而转变为从属关系。机器体系与工人的关系，同“单个工人”与劳动资料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对“单个工人”来说，工具是工人延伸的器官，工人通过自身的技艺使用工具并创造价值；但是在机器体系对原材料发生作用期间，工人只能发挥中介作用，机器体系依赖自身进行运转，工人成为延伸的机器，即“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占有，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②在前工业时代，劳动支配生产过程，生产过程是劳动的一部分。而在机器体系之下，活劳动被剥夺了主体创造力，成为机器体系的一个活的零件，并丧失了生产过程中的支配地位。劳动过程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中的环节之一。

在劳动资料逐渐进化成为机器体系之后，作为劳动资料的产品和生产力本身都成为物化劳动的一部分。进一步说，知识、技能甚至情感等社会生产力被统摄于一般生产力之下，成为固定资本的一种类型，并投入生产过程中。如此一来，“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③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集中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发达，在面对作为当时社会生产力最高水平体现的机器体系时，于资本增殖无益的部分都被视为无用的，工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被异化为机器体系的附件。至此，活劳动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要素，在机器体系中预设的那种科学生产力并不能传导到工人的大脑之中，工人的主体性在这一生产过程中日渐普遍化。这种普遍化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能力上的调整，而是被剥夺了生产过程中需要的知识和智力之后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雇佣工人作为机器体系的附件，已经丧失了被“解放”的基本前提，即作为人的本质。

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多少不再仅仅取决于直接劳动时间，而更多地取决于社会一般生产力。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尽力压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将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致力于更多地占有剩余劳动时间。这一关系的矛盾之处还在于，资本通过机器体系创造更多的剩余时间，再通过占有剩余时间来实现对剩余劳动的占有。

马克思认为，创造足够充分的剩余时间必然会导致产能过剩，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将不再继续产生剩余价值，过剩的劳动力将中断这一循环，剩余劳动时间将不再用于进一步产生剩余价值，而是被解放出来成为自由时间。^①

就此而言，自由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是既等同又对立的，等同之处在于其指向同一段剩余时间，而对立之处则在于其用途之迥异。在极度匮乏的状态下，财富被迫以直接劳动时间为尺度来衡量。而在机器体系下，财富的度量则以剩余劳动时间为尺度。在进一步发展之后的机器体系之下，衡量财富的尺度将不再是直接劳动时间，而是个人生产力。此时，劳动者将重新占有以机器体系为载体的科学和知识。

对“机器论片段”进行重新发掘和阐释的重要意义在于，正视当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状况，从马克思的经典论述重新出发，对新的实践形式和实践内容予以关切。我们不仅要外在地反思生产力变迁状况，而且要对这一变迁过程中的主体变化进行反复确认和判断，在对主体和客体进行的双重思考中，避免理论成为理论的概念，而让主体成为主体自身。我们并非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解读“机器论片段”，而是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新发现“机器论片段”的价值。

三、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生产方式

（一）马克思的“精神生产”概念的发展

马克思的“精神生产”概念以及相关的生产理论，大致形成于19世纪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4页。

40年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① 这表明，马克思将艺术视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② 不仅有饥饿等自然的、现实的身体需要，而且有感性的需要。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明确使用了“精神生产”一词，“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人类的发展，就是以这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甚至**精神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③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相提并论，认为作家、艺术家等进入生产领域，其产品的价值同样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虽然当时的英国并未形成文化产业，但是精神生产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视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作为生产者的人不仅是抽象的人，而且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共通性，即由于生产资料为统治阶级支配，故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⑥ 精神生产并非自然人的意义上的智力活动，思想、观念、意识等作为生产资料同样会被纳入生产过程。

在《大纲》的“导言”部分，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展开了进一步分析。除了对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不均衡现象的论述，马克思还谈到了精神生产与精神消费之间的关系。与物质生产类似，“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⑦ 精神生产为精神消费创造对象，同时也塑造精神消费的主体。1857—1858年，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机器论片段”一节。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此之前，关于精神生产的概念、内涵等，马克思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论述。从“机器论片段”到《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马克思反复提及精神生产与大机器时代之间的微妙关系，强调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并讨论了大工业时代自然科学对生产力变革的巨大推动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精神生产中的劳动和人的智力紧密结合在一起。而物质生产则不同，在一般生产力对象化为机器体系之后被迫与劳动分离并为资本占有。在这一阶段，精神生产的劳动主体必须掌握生产技术，而且技术无法从主体中分离出来，劳动主体同时也是部分的生产资料。在劳动主体和生产资料尚未分离的情况下，精神生产的产品可以被复制，而精神生产的过程却无法被直接纳入机器体系。因此，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未缩短，依然处于较为原始的直接生产劳动阶段。马克思指出，只有在产生剩余价值的情况下，劳动才具有生产性，不产生剩余价值但产生劳动产品的、用于直接交换工资或者利润的劳动，依然是非生产性的。^①与此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精神生产的价值二重性：一方面，精神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另一方面，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强调的那样，精神生产仍然部分地保留了非功利的审美价值。

机器体系大大缩短了生产物质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较之下，人类社会的生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处于原始的直接生产劳动阶段。艺术家作为精神生产的主体，凭借知识、想象力、情感等一般生产力对生产资料进行加工，进而生产出艺术作品。

（二）人工智能在精神生产领域的三条应用路径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②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当今世界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一代数字技术蓬勃发展，为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进入20世纪之后，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上升，科技成果被大量应用于精神生产领域。1956年6月，四位年轻的科学家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纳撒尼尔·罗彻斯特（Nathaniel Rochester）和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Dartmouth）共同发起并组织召开了用机器模拟人类智能的暑期专题研讨会，讨论了用机器模拟人类大脑的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141页。

^②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可行性。正是在这次会议中，他们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①这也预示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数十年来，人工智能已从想象中的概念转变为技术革命的动力源泉之一。特别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并迅速应用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领域，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质量，甚至有可能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看，马克思“机器论片段”对我们分析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作为社会生产力高度凝结的产物，人工智能更加广泛、深入地替代了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并试图在精神生产领域全面渗透，这可能会减少精神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增加剩余价值。

在人工智能的众多应用领域之中，文学起初并不为人特别关注。但是，随着人工智能在文学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影响范围越来越大，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开始深入思考人工智能与文学生产的关系，并密切关注该领域的发展变化趋势。迄今为止，人工智能在文学生产中的应用有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以人工智能作为主体进行文学创作。20世纪80年代后期，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研发的诗歌创作软件 Ray Kurzweil's Cybernetic Poet（RKCP）问世。在此后的十年间，研发者对软件进行了数次升级，并最终生成了可以选定作品风格的诗歌创作程序。这一程序首先通过输入、分析人类诗歌作品来创建语言模型，然后对单词使用、单词序列模式、节奏模式和整体诗歌结构进行分析，最终从语言风格、节奏模式和诗歌结构三个方面对诗人风格进行模仿，从而生成“原创”的诗歌。这一程序的短板在于缺乏自我修改和自我进化的能力，只能依靠人类预设的审美规则组合材料，无法生成一个内置的更高层次的标准，因此也就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造力。在官方网站上，RKCP被描述为一个生成基础诗歌并提供修改建议的辅助角色，在付费升级之后，则可以具备更多的辅助创作功能。这表明，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成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实践并不成功。

第二条路径是将人工智能作为文学生产的辅助工具。1991年，Write Brothers公司开发了写作软件Dramatica。相较RKCP，Dramatica具备更加复杂的生成模式，更加凸显了人工智能作为生产资料的属性。作为在故事创作领域颇有建树的交互式故事引擎，Dramatica的基本运行模式是在开发者输入了3万余个故事原型之后，通过分解、分析每个故事中的戏剧元素，对用户建构的角色、情节、主题、流派等提供分类和修改建议。Dramatica的功能并不在于生产原创性作品，而在于介入用户生产过程并提供帮助，其作用

^① 参见李德毅、杜鹃：《不确定性人工智能》，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仅限于协助活劳动进行大量筛选、对比和修改工作，以缩短劳动时间。因此，这一软件可应用于商业属性强的影视剧剧本创作领域。Dramatica 的真正着力点在于更大限度地利用“原型数据库”，实现“故事”产品的批量化生产。其中，工人（写作软件的使用者）仍是劳动主体，这与马克思提及的一般智力并不相同，后者是以故事引擎面貌出现的机器体系，实现了劳动主体与生产资料的部分分离。

第三条路径是使用以数据收集、建模分析、标准化产出为基本模式的人工智能写作软件。这些软件被普遍应用于传媒、线上阅读、知识分享等文化产业领域。2014年，美国联合通讯社在新闻报道中首次启用“自动化写作”机器人。2015年，新华社正式启用“快笔小新”承担体育和财经方面的新闻稿初稿撰写工作。此后，腾讯的“梦幻写手”、南方报业的“小南”等智能写手相继投入新闻、资讯、公文生产领域，谷臻故事工场的“谷臻小简”则以编辑和导读的身份进入文化产业，以对文学作品进行信息提炼的方式生产导读产品。

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精神产品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审美创造，而是被纳入资本价值增殖过程。

各类人工智能，不论是结构模拟还是功能模拟，其实质都是试图进一步取代人的智力劳动的机器体系。人工智能是由活劳动创造出来的，而作为一种生产工具，它最终又要加入生产过程，使原材料变成产品。这就是人工智能的使用价值所在，具有明确的工具属性。

“微软小冰”创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号称是一部以人工智能为创作主体的文学作品。“微软小冰”在学习（输入）了519位中国现代诗人的作品之后，运用一定的算法模拟人脑的创作方式，创作了上万首诗歌。之后，相关人员再从中编选出139首，组成了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微软小冰”是一套人格化的机器体系，它与工人（编选者）的操作相结合，将《阳光失了玻璃窗》生产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并不是人类与劳动对象之间的中介物，工人反而成为人工智能作用于劳动对象的中介物。工人的主要任务不过是负责维持人工智能系统的正常运转、提供劳动材料、对产品进行筛选等，他们并不需要掌握人工智能机器体系的核心技术。此外，人工智能还具有“进化”的功能，通过不断输入活劳动与人工智能自身的劳动产品进行自我完善。

本文开篇提到过的《埃德蒙·贝拉米肖像》，号称是世界上第一件由人工智能算法创作的艺术品。与《阳光失了玻璃窗》的创作类似，这一画作是在开发团队输入14—18世纪的15000幅肖像画之后，由生成对抗网络算

法生成的。与《阳光失了玻璃窗》不同的是，这幅肖像画的最终版本并不是在人工介入挑选过程之后形成的。它的生产过程大致如下：首先，由生成算法“学习”并生成画作；其次，由另一部分鉴别算法对生成结果进行视觉图灵测试，从而找出生成结果与输入要素之间的差异；最后，只有当差异小到让机器无法分辨现有画作和所创画作之后，画作才会最终形成。有趣的是，这幅画作的作者签名是生成它的数学公式。开发团队认为，人工智能通过复制人类行为来发挥作用，还需要通过自己的路径进行学习和进化。与《阳光失了玻璃窗》相比，《埃德蒙·贝拉米肖像》的生成过程进一步降低了人类在创作过程中的参与度，将筛选过程交由人工智能来完成，而工人只不过进行了“构思”的劳动。其后，这幅作品被顺利拍卖。这也意味着，以人工智能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品已经具有了市场价值。

（三）人工智能作为人的延伸

就文学生产而言，人工智能使用的劳动资料是人类过去生产出的文学作品。我们关注的焦点是，这种新型生产方式最终是否可以生产出具有原创性的文学作品。

艺术作品的生产过程长期被认为必须由活劳动直接完成。然而，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人工智能介入了艺术作品生产过程，人只需要负责操作机器，信息收集、输入、输出等过程都可以由机器独立完成。在放弃了物理意义上的还原论之后，人工智能采取了进化论算法，通过不断地输入、模仿进行自我进化，来模拟人类的“学习”能力。这样一来，精神生产就脱离了活劳动在直接的生产劳动中实现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阶段，转而进入了生产资料在吸纳现有劳动产品基础上进行自行创造的阶段。当然也要看到，人工智能尚未实现从活劳动驱使生产资料到生产资料驱使活劳动的转变。迄今为止，机器体系依然是一种人的延伸，而不是真正具备独立创作能力的主体。就目前情况而言，文学生产方式仍然是以作家的直接创造为主的。

近年来，人工智能从事文学创作的案例越来越多，但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依然不容低估。2016年，由人工智能创作的小说《机器人写小说的那一天》通过初审，入围日本文学奖“星新一奖”。不过，该小说的创作团队对作品生成过程的介绍表明，这一作品的创作仍然需要人设置好大量的要素，包括人物、情节梗概和词句素材等，也就是说作品的主体部分仍然是由人来完成的。

国内亦有类似的文学生产软件。例如，清华大学自然语言处理与社会人文计算实验室于2017年研发的人工智能诗歌写作系统“九歌”，在输入了

80 万余首中文诗歌作品之后，可以输出律诗、绝句等多种体裁、多种风格的古体诗歌。2019 年，“九歌”2.0 版本上线，增加了“人机交互创作”模式，用户可以在“修改模式”下参与诗歌作品的修改和生成。这一系统的升级似乎暗示着，人工智能尚未拥有完全取代甚至超越活劳动精神生产的能力。在经历了短暂而机械的对原创性的拟态之后，人工智能似乎又回归到劳动资料的从属地位。

四、挑战与机遇——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生产的前瞻性讨论

上述案例表明，近年来的种种尝试尚未使人工智能在主体意义上取代活劳动。然而，这些尝试已经对现有的理论边界造成了冲击。2002 年由孟京辉执导的影片《像鸡毛一样飞》通过诗人之口准确地预言了文学量化生产的景象：“如果以前得到它你要付出你的灵魂，可现在你得到它只需要付出 10 块钱。”在电影中，诗人欧阳云飞在江郎才尽之时，意外地用 10 元钱买到一张盗版光碟，借由光碟里的系统，输入特定的诗歌风格，便生成了一首诗歌。此后，欧阳云飞放弃了创作，并凭借光碟“生产”的诗歌重新成为畅销诗人。可见，这部电影的创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生产的危机。

（一）主体性的衰退——文学生产的挑战

《像鸡毛一样飞》这部电影早已预示了批量化文学生产方式的可能性。这种批量化生产方式的实质是，将文学的创作规律公式化、科学化，并有意识地将其运用到创作中，进而压缩单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将剩余劳动时间投入重复的生产中，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不过，文学创作终究属于精神生产范畴，并不具备大幅压缩单个产品的劳动时间的条件。因此，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虽然出现了分工，但长期处于前机器体系时代原始的直接劳动模式之中。文化产业的剩余价值是十分有限的，导致该产业在很长时间内都未能成为支柱性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的应用具有划时代意义：文学作品的量产具备了现实可能性，由人工智能进行的文学生产在某种意义上不只是精神的活动，还具备物质生产活动的特性。

人工智能对文学生产的影响无疑是极具震撼性的。从创作者（文艺作品生产者）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量化生产带来的冲击与机器对工人的威胁有高度相似之处，而后者也正是卢德主义出现的前提。所谓卢德主义，指 19 世纪的欧洲工人认为大机器取代了劳动，导致了他们的失业，因此掀起了抵

制大机器的运动。与之相似，对艺术作品生产者来说，“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①一旦文学作品可以量产，就可能导致在直接劳动下独立创作的精神产品的市场空间被挤压，以及创作者生存发展环境的恶化。悲观的预期是，文学作品将会被批量生产，而不再是一种艺术创造。如果文学叙事和文学记忆都被新的技术手段转化为丰富的数据，那么它们构成的知识也就相应地被转移至数据存储系统中了。同样地，创作权利也将会自然地客观化于载体与技术共同构成的新型机器体系也即人工智能之中。在新的约束条件之下，作者甚至有可能丧失作为“工匠”的资格，变成机器的附属品，服从于这种自动化的规则。当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作者的独特性仅仅表现在对主题的偏好上，这与工厂流水线上的质检员并无二致。“从前，在荷马那里属于奥林匹克神的观照对象的人类，现在成了为自己本身而存在的人，他的自我异化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人们把自我否定作为第一流的审美享受去体验。”^②长此以往，我们在文艺创作过程中丧失的不仅是本雅明说的“光晕”，即艺术品独一无二的光晕，而且连整个生产过程独特性也丧失了。这是因为，归个人所有的最后的生产资料终将分离出去，对自我创造力的否定或将导致人类彻底异化为工具。如若丧失了审美创造主体性，我们就会面临精神上的贫乏与空虚。

这种流水线式的文学作品生产方式是基于对已有作品的复制、拆分、重组而进行的，这一过程与自然语言系统的生成是对立的。这就意味着，语言的“例外”将会消失，系统生产的或许仅仅是大量换汤不换药的同质化内容。从接受者的角度看，阅读者的接受过程也就是信息的输入过程，一旦接受的信息趋于同质化，那么阅读就再无思考的精神愉悦可言，我们将要面对的就是精神和审美的荒原。

总之，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一次巨大的技术进步，也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力变革。毋庸讳言，这种极为复杂的客观化的机器体系在文学领域的应用将不可避免地被纳入资本的自我增殖活动，被倒置为资本的一种存在方式。在这种异化的形式中，文学作品和物质产品都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正如许多物质产品不再是工人智慧的结晶一样，精神生产也不再完全是马克思所说的创造性劳动，而异化为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人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② [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智能时代文学生产面临的挑战，是作家主体性的一退再退，是作品审美性的一减再减。

（二）审美反思——文学生产的机遇

人工智能给文学生产带来的不只是挑战，还有机遇。

文化兼具功能性和审美性。首先，从功能性角度看，人们从事公文、新闻等核心意图不在审美而在信息传递的功能性写作，同往昔工人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信息密集型产业中，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替代人们完成一部分机械化的精神劳动，而人工智能在功能性写作方面的应用一旦成熟，就将大量取代活劳动。这一趋势无疑会导致文化产业剩余价值的大量增加，进而在与物质生产类似的过程中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劳动者从事更具创造力的工作创造技术条件。

其次，从审美性角度来看，审美活动本身就具备反思能力。量产的文学作品仅仅是通过学习、模仿前人作品而生产出来的，这些作品是基于语法和文学理论的一种逻辑上的排列重组。文学的表达方式可以被机器体系学习，但文学承载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绝不是人工智能能够复制的。精神生产是基于人的精神需求而存在的，其中自然包含对美的自觉追求。人工智能技术革命的那些推动者或许应该重温康德的名言：“人，一般说来，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随意使用的工具。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对其他有理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① 真正的危机，不在于人工智能作为机器体系是否给文学生产领域带来了冲击，而在于生产关系的结构性调整是否能够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在实施这样的调整时，必须牢记康德强调的，人终究是目的本身，而非意志随意使用的工具，更不应该是附属于机器而被资本随意使用的工具。精神生产固然有其工具性的一面，但决定文学艺术根本属性的依然是审美创造力。

如前所述，当人工智能大量取代人类的精神劳动时，人类的普遍剩余时间将会增加。然而，同物质领域的发展一样，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趋于饱和时，人类社会就将呈现马克思描绘的图景：“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

^① [德]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学等方面得到发展。”^① 最终，剩余劳动时间将主动违背资本的意志，转变为人类的自由劳动时间。在自由劳动时间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之后，文学生产将摆脱劳动和审美之间的对立，真正实现“无目的的合目的性”。^②

这样看来，文学生产的危机并不是人类思考灵光的缺乏，而是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精神的审美性追求对人类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需求，大众总会在精神生活层面不断摇摆于反叛与秩序重建之间。如果说“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的盛行是一种文化翻盘，为实现平等的精神输出提供了技术手段，让社会各阶层的劳动者都能参与创造力的输出，那么随之而来的对“良心剧”“良心书”的呼吁同样是大众审美追求的反映。需要高度关注的是，市场最先捕捉到大众需求的变化，以文字、图片、视频等为主要产品形式的非物质生产在短暂的自由创作之后，被迅速纳入资本增殖的环节，以各种便捷的图片、视频编辑软件为代表的机器体系开启了新一轮快速发展进程。这显示了文化生产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重要一环，对文学作品以及作者与读者的精神、审美和创造力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此背后，审美现代性始终暗流涌动，精神的伊甸园从未消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科学技术的使用价值在于制造剩余价值，而非解放劳动。^③ 这是对资本主义逻辑的刻画。一旦摆脱资本主义的逻辑，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活劳动的解放，那么人类将真正从精神劳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文学创作将进入真正的自由王国。当人类社会进入了这一新境界之后，我们将实现多重解放：首先，解放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机器体系，将其从资本主义的占有中夺回，使其重新成为人类实现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有利途径；其次，解放被异化为固定资本的知识，实现劳动主体与知识的重新结合，劳动者将更充分地占有生产资料；最后，把人类从大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给予其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自由。到那时，作为审美创造的文学和艺术将成为人确证自身的手段，以实现真正自由的发展和繁荣。

(责任编辑：延 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②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页。